

第一章 導論

研究動機和主題說明

2005年，根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國大陸總人口數正式突破十三億，依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龐大的人口既可能造成中國大陸的經濟負擔，也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如何理解人口變化的規律，並把人民的素質提高、數量控制在適當的限度之內，既是傳統經濟學、社會學關注的焦點，也是1970年代生態學的討論重心。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與西方學術界交流日深，人口問題也成為各界關心的重點。此一時期，吸引眾多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而碰觸到中國人口問題的學者，並展開了諸多討論，同時引發了國際間明清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熱潮。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80年代末期開始、由黃宗智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展開的關於東亞農業內卷化（involution）生產模式的論戰，雙方熱絡的討論與爭辯，成為各方焦點，至今未歇。時隔近二十年，李中清和王丰的**人類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一書出版，不但對這場論戰進行評價，甚至本身也加入了戰局，同時作者又另闢蹊徑，在理論上挑戰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如果從民國元年起算至今，李中清的批評，已經是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中第三次對馬爾薩斯理論提出批評了。¹如今包括中國大陸的學者李伯重、曹樹基等人，又再一次加入戰局，中國人口問題從現實的視野走進了歷史與理論的視野。

這些討論的焦點，即中國是否具有與西方社會在本質上有別的特殊經濟發展模式，並非本文主題。不過，它卻引發筆者對於中共歷史中一段史事的重新關注，即馬寅初與「新人口論」的遭遇。

長期以來，筆者對於知識份子的相關議題和處境頗感興趣。如果對照中西知識份子在社會啓蒙的角色扮演上，將會發現其中最大的差別就在於知識份子與政治、社會之間的關係遠近。一般而言，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與政治、社會的關係，遠比西方啓蒙知識份子為近，儘管西方啓蒙知識份子也有其自身的政治、社會立場。政治、社會關係的遠近，一方面與各自歷史傳統有關，也與其所處的政治、社會情境有關。由於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與政治、社會關係的親近，也使得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遭遇和社會處境，更顯得波瀾起伏，因為隨著知識份子與政治黨派、政黨派系的關係緊密，一旦政治上有什麼風吹草動，不同群體、不同政治立場的知識份子群體也會有著不同的命運。

¹ 儘管李、王二人至今為止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美國，但他們的研究所引發的討論和關，注仍舊以華人學界最為熱絡，故將這一波討論與前兩次對馬爾薩斯理論的討論和批判連貫來看。

自清末至民初，不論是康梁改革派（或曰保皇派）、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派，乃至於中共，自始都是知識份子為主發起的團體。在 19、20 世紀世界各國的革命歷程當中，知識份子作為各國改良或革命發起動力的現象，屢見不鮮。²但是在中國，並非所有的知識份子在政治上都走向激進化，胡適、陳寅恪等人的生命歷程，以及近人對於嚴復的研究，都顯示出不同的選擇。³而這些在政治上沒有走向激進化的知識份子，也並非全然都走向了邊緣化，胡適從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是明顯的例子。⁴而許多激進化之後的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日益緊密，在中共建政前後，出現了一批「黨化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不但在政治意識上日趨激進，本身也加入了中共的外圍組織，並在延安整風之後大體完成了黨化的過程，周揚、何其芳等便是其中的重要例證。然而，也並非所有在政治上走向激進化的知識份子都走向了黨化，馬寅初就是一個例子。他畢生與近代中國政治的關係保持著一定的關連性，但卻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黨派。⁵因此，關於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中國近代政治的快速變化過程當中的角色和心路歷程，任何簡單化的理解和論點都將有以偏概全的危險。

馬寅初特殊的生命歷程引發了筆者強烈的興趣，試圖藉此重新檢視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與政治、社會的關係，尤其是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隨著對馬寅初生命歷程及經濟思想的深入理解，筆者卻發現，1950 年代後期馬寅初所遭到的批判，在當今的歷史解釋中，被賦予了一個形象，即中共在反右運動中錯誤批判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案例。不過筆者認為，馬寅初被批判一事，不論就其性質或時期，都與反右運動不同，只是有時間上一部分的重疊，有必要重新釐清。既是如此，就必須進一步追問：那麼為何 1950 年代後期中共會批判馬寅初？批判的內容和重心為何？應該如何看待此一事件？

藉由上述的思考，促使筆者不再以政治打壓作為理解馬寅初事件的單一角度，而企圖將馬寅初和「新人口論」的各種爭議，乃至於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的心路歷程，置於一個更為寬廣、且更為深遠的歷史脈絡之中。

馬寅初(1882-1982)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留美經濟學家，1955 年至 1960 年間，因提出「新人口論」而遭到批判，直到 1979 年才獲得中共當局的平反。從現有的歷史解釋來看，批判馬寅初一事在中共改革開放時期，被形塑成「錯批一人，多

² Laurance Kaplan ed.,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Vintage, 1973); 另可參考 Theodore H. von Laue, *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1987). 本書作者特別強調了二十世紀各國政治革命當中，都有著思想和文化革命的成分，而知識份子在�其中皆扮演重要角色，詳見本書頁 27-35。

³ 如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台大文史哲學報*（台北），第 56 期，民國 91 年 5 月，頁 29-68。

⁴ 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並非是政治權力的象徵，但是胡適就任此一職位，至少就當時而言，絕非走向邊緣化。

⁵ 一說馬寅初曾加入同盟會，但未能看到直接證據。

生三億」的形象。⁶此一說法不但將馬寅初事件視為中共在反右運動時期批判知識份子的錯案例証，因而使得中國大陸人口快速增加無法扼制，也成為 1980 年代中共推行「一胎化」計劃生育必要性的重要佐証。然而經過史料的分析與爬梳，筆者認為，馬寅初事件的相關歷史事實有許多基本的誤解：馬寅初事件遠非反右運動案例所能解釋，並與中共是否要推行計劃生育無關，但要說明此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卻又不能只是在事件始末本身打轉。因此本文試圖將馬寅初事件的相關歷史重新梳理，並將其放在一個更多層次、更為寬廣的歷史視野中，從多重的視角重新看待馬寅初事件。唯有如此，方能對此一事件獲得較為全面的理解。

除了歷史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之外，馬寅初「新人口論」的重點到底為何？他到底是在何種政治、社會情境之下，寫下「新人口論」並公開發表？這或許是更為根本的問題。現有的研究顯示出一種同質性極高的偏向，即馬寅初強調要控制中國人口，是人口問題上的先行者，但與當政者觀點不同，因而遭到批判。果真是如此嗎？

文獻回顧

兩岸學界對馬寅初事件的討論非常多，通常是把馬寅初事件置入兩個當時的政治脈絡之下進行考察，一是作為反右運動過程中，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個案，一是作為中共人口政策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倒退事件。前者的觀點，通常可以各種馬寅初的傳記、反右運動的專著為主，正是本文欲詳加論証的主題，本文將在第二章進行分析。後者的觀點，則多半是從近代中國人口研究的歷史過程當中檢視馬寅初事件的歷史意義：通常是把此一事件看成是倒退的表現、逆流的例証，尤其是 1980-1990 年代中國大陸的研究者更是如此。

田雪原出身北京大學經濟系，正值馬寅初擔任校長的年代，在 1970 年代末期大力為馬寅初翻案，1981 年擔任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他認為，自從馬寅初被批判之後，人口研究成為禁區，計劃生育無實施，因而造成中國大陸日後的人口急速增加。⁷然而越是晚近的研究，越是對此看法表示保留。郭志儀從歷史考察的角度指出，自 1956 年至 1978 年間，除了「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期間，中共中央始終都沒有放鬆人口控制的工作。⁸

⁶ 此語一說出自胡耀邦。

⁷ 田雪原，「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翻案」，*光明日報*（北京），1979 年 8 月 5 日，第 3 版。此外還有吳躍農，「邵力子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史海鈞沈*（北京），2004 年第 5 期，頁 34。本文認為邵力子比馬寅初更早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子舒，「馬寅初與新人口論被批判的前後」，*黨史縱覽*（北京），2002 年第 7 期，頁 20-21；王滌，「馬寅初人口思想再認識」，*人口與經濟*（北京），1998 年第 4 期，總第 109 期，頁 36 等。不過，人口研究成為禁區的原因，姜濤有不同觀點，他認為，是在 1956 年王亞南批評羅爾綱之後，人口研究便已成為禁區。詳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台北：南天，1998），頁 408。

⁸ 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蘭州），2003

至於台灣的研究者，對於馬寅初的問題，則集中在 1980 年代。林金水認為毛澤東與馬寅初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是對立的，馬寅初、陳達、吳景超等人因而在反右運動中遭受批判。不過，林金水也注意到，中共自 1960 年代初起，便已進行計劃生育。⁹鄧辛未對於馬寅初事件的看法則與田雪原等人基本一致，不過他特別注意到中共自身的人口理論探索，不過未能有效區分蘇聯的社會主義人口規律與「人手論」的差別。¹⁰

西方學界對馬寅初事件則知之甚爲了了。關於馬寅初事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幾乎無所論及，而中共人口政策與馬寅初事件的關係，則是他們研究的重心。富利奔（Michael Freeberne）早在 1964 年即已注意到中共的人口政策之實施情形，並認爲 1962 年起中共第二波的計劃生育運動，顯示了自 1957 年起以馬寅初爲代表的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大批判運動衝突已告一段落，並獲得克服，而馬寅初的觀點正是代表第一波的計劃生育運動。此舉顯示中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情勢走向相對平穩階段。¹¹但是富利奔對於他所界定的第一波計劃生育運動，並沒有太多的解釋和分析。蒂倫·懷特（Tyrene White）的論點則頗有新意，與本文有較爲直接的相關，有必要進一步討論。

懷特認爲，關於中共人口政策發展的歷史解釋，至少有四點必須重新檢視。一是 1949 年以前和以後的節制生育政策有其連續性，難以一刀切；二是中共進行節育的動力不僅來自於中共高層，並來自社會各階層，同時決不只是經濟上的考慮；三是 1950 年代中期反對降低生育率是由於採用了群眾運動手段所導致的結果；四是毛澤東並不反對節制生育，他不是制訂穩定人口政策的主要障礙。¹²懷特強調，中共所推行的計劃生育，並不是基於夫妻之間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和權利決定子女數量和生育間隔，而是宏觀的政治概念。由於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扮演著計劃者的角色，擔心人口成長的無政府狀態將造成經濟發展的阻礙，而其後果則主要由婦女承擔。她同時批評，在 1952-1957 年間中共的計劃生育，是由三個因素所決定，一是婦女對節育手段的迫切要求，二是計劃經濟與人口控制的關連性，三是出於對經濟，尤其是對農業部門情況日益增長的不安。其中，婦女的要求往往在以往的研究當中被忽略。¹³而這一點也正是懷特的特殊貢獻。不過，懷特也點出那些從人口與經濟的關係去研究的人，往往過於強調意識型態

年第 4 期，頁 5。類此觀點在中國大陸的網站文章中有一股不少的支持者，但是大多未能以學術研究的角度進行論述，郭志儀的文章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將此種觀點以學術研究的方式表述出來。

⁹ 林金水，*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與中共的人口政策*（台北：幼獅，1987），頁 105-111。

¹⁰ 鄧辛未，*中共生育計畫的分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69-76。

¹¹ Michael Freeberne, "Birth Control in China", *Population Studies*, 1964, no.1, vol. 18, pp. 5-16.

¹² Tyrene White, *China's Longest Campaign: Birth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2005* (New York: Th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

¹³ Tyrene White, *China's Longest Campaign: Birth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2005*, p. 20.

的作用。

在懷特的諸多論點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幾點：

首先是毛澤東對於計劃生育的觀點和態度。懷特認為，毛澤東一直到 1958 年大躍進開始之時，都從未否認過節育的重要性，並列舉若干毛澤東的公開講話以資證明。並且，懷特認為，1962 年中共中央頒布「關於認真積極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是中共實施計劃生育的關鍵性文件，因為這個文件將計劃生育提高到了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環節，而不只是個別的或臨時的政策。¹⁴這些看法與兩岸學界長期以來的觀點大不相同。筆者認為，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的態度，不但如同懷特所言，而且，不僅只是他面對 1950 年代的中國大陸政經情勢所造成，而是有其自身思想發展的連續性。至於懷特注意到 1962 年的關鍵點，筆者可以理解，但這只是政治角力下的結果，真正的過程起點必須回溯到 1954 年。

其次是人口與經濟的關連性。懷特認為，這是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對於中共計劃生育所慣用的研究切入點。不過，就筆者的了解而言，西方學界對此一問題的探討，大多是從政策面，即社會主義化（尤其是農村集體化）與計劃生育的關連性進行討論。¹⁵至於在原理層面，西方研究者大多只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原創者的人口思想，尤其是恩格斯；並且把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的論點作為計劃經濟與計劃生育的關連性證據，但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理解這些問題，以及 1957-1959 年間「人口論」和「人手論」之間的爭論，則毫無所悉。¹⁶至於馬寅初事件，則都只是簡單帶過，更遑論把馬寅初事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做進一步了解。

上述各類文獻的研究成果，成為了本文的養分，同時也成為本文的出發點。這些文獻已提出多種不同面向的研究成果，因而筆者也將以多重解讀的視角，重新解讀馬寅初事件。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歷史事件發生於複雜的時空脈絡之中，其間的含意及其因果關係往往必須由多重意義下的解讀中方能呈現。然而歷史事件的複雜程度，係由各個歷史事件本

¹⁴ Tyrene White, *China's Longest Campaign: Birth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2005*, p. 48.

¹⁵ 上引 Michael Freeberne 的觀點。

¹⁶ 如 Susan Greenhalgh & Edwin A. Winckle,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尤其是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較為詳細討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口思想，以及毛澤東時期的中共計劃生育成敗對計劃經濟的影響。

身牽涉到哪幾些層次所決定。此外，考察了歷史事件的各種層次的背景和原因之後，還必須確定各種因素之間的主次排列，而此一排列，必須有一個依憑的標準，即研究者在何種標準之下排列事物成因的主次關係。以歷史研究的領域而言，所謂的標準，即是一種研究歷史的切入點。同樣的事件，從不同的切入點考察，其事件的各種成因極可能便有所不同，而各種成因之間的主次先後也會不同。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馬克思主義史學 (Marxian historiography) 和年鑑學派 (The Annales School)。

如果把整個年鑑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做一整體比較，不難發現，同樣對於資本主義相關的歷史考察，二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偏重點也不同。在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的長時段框架中，自然條件 (地質、氣候、水文等) 是變動週期最長遠的 (幾乎無所變動)，因而也是長時段架構中的第一層，而馬克思主義學派長期以來所注重的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等概念，只是布勞岱長時段架構中的第二層，即社會結構的變動——當然，這兩個學派在社會結構變動的層次上，仍有不同的偏重點。不過，馬克思主義學派重視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強調社會結構在轉變時期的變動性，年鑑學派則側重社會結構的恆常性，相較之下，年鑑學派的歷史解釋還更具開放性，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歷史解釋則常與當下的政治社會處境有著更為直接的連繫。¹⁷

從上述的說明可知，如何選取恰當的切入點作為判斷歷史事件成因的標準極為重要。本文試圖從梳理事件本身尋求各種必須考慮到的解讀層次，對馬寅初事件進行較為全面而廣泛的考察，而不僅僅是把馬寅初事件視為中共治下知識份子又一不幸的遭遇。而釐清歷史事實本身的來龍去脈，又是進行多重解讀的前提。可以看到，不論中西學界，大多只將馬寅初事件進行共時性 (synchronic) 或當下 (contemporary) 的等橫向考察，而不考慮貫時性 (diachronic) 或歷史 (historical) 的縱向考察，這是絕對不足的。一方面，批判馬寅初的人口問題，某種程度而言，與反右運動雖在時間上重疊，但性質上並不屬於反右運動的範圍。同時，要真正了解馬寅初與其批判者之間觀點異同之處，不能只是孤立地看待馬寅初的觀點，不但必須要將馬寅初的論點與批評者的論點進行比較分析，更重要的是，還比須放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政經背景下去理解。這些問題是屬於橫向面向。另一方面，造成馬寅初被批判的原因，還必須考慮到其它縱向的因素，一個是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歷史考察，一個是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在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遭遇。

17 此一評價出自 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 此外還可參考 Geor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8, 70. 另外有關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歷史概念，可參閱周樑楷，「一九五六年對英國馬克思史家的衝擊：以哈布斯頓和湯姆森為分析對象」，收錄於**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91)，頁 235-261。

基於對相關文獻的分析與整理之後，筆者認為，關於馬寅初的基本史實之澄清，實有必要，因此本文第二章將從基本史實的建立做起，討論馬寅初事件的來龍去脈。建立了基本事實之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馬寅初的思想演變。

由於馬寅初一生身處中國近代百年的變局之中，橫跨三個政治分期，而不論在民國時期或中共建政之後，皆以敢言著稱，加上馬寅初事件本身，又是「以言招罪」的表現，故理解馬寅初的學思歷程和變化，對於理解馬寅初事件本身，不但是必要程序，也是開展多重解讀此一事件的第一步。這將是本文第三章的工作。此外，當時批評馬寅初的詞匯當中，最為具體而明顯的是指稱馬寅初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的變化中，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時而受到推崇，時而受到責難，其面目和待遇遠比其它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來得複雜，尤其是現代中國的激進人士，包括孫中山以及後來的中共理論家，對馬爾薩斯的責難比起其它西方思想家來得明顯，箇中原由，實有必要釐清。因此本章也將針對此一問題，從中西思想交流與中國所處情境等方面，進行考察，並兼論及馬寅初的思想與馬克思、馬爾薩斯思想之間的關連性。

此外，就縱向的角度而言，還必須注意到，馬寅初事件的确是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重要個案，然而縱觀其生平及遭遇，它既非中共反右運動中的案例，與此同時，其它還有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與馬寅初的遭遇非常類似，而與那些著名的反右案例有所區別。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這些人在中共建政之後的自我意識當中，明顯有著將自身學思心得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會通的表現，甚至如馮友蘭一般，企圖把自己的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化」。¹⁸本文稱此一團體為「傾左知識份子」，這是以往研究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時候幾乎未曾注意到的，或不曾細究的問題。因此，本文第四章針對此一類型的知識份子群體進行考察與分析。

就橫向的角度而言，也必須了解到，當時批判馬寅初的思想，就內容來看，集中在兩個部分，一是「新人口論」，一是「團團轉理論」。「新人口論」的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國民經濟中積累與消費的關係，一是人口與計劃生育。而「團團轉理論」可以說是馬寅初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綜合平衡的認知所提出的哲學思考。這兩部著作的三個主要論點，1950—1960年代的批評者集中在積累與消費的關係和團團轉理論，而1980年代以來的平反者則集中在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問題上。如果考慮到1950—1960年代中共急進的經濟措施，以及1980年代以後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這些背景，可以發現，馬寅初在同一個時期提出的三個論點，在不同時期受到不同的關注，而且，對此三個論點的正反評價，不但與當時的時代調性有關，也與中共的政策背景有關。因此，本文第五章不得不從當時中共的政經措施為背景，看馬寅初與中共當局對於時局與政策的看法有何差別，為何中

¹⁸ 馮友蘭，「我同毛澤東的幾次交往」，書摘（北京），2005年第4期，頁8-12。

共學政各界有多人會指稱馬寅初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新馬爾薩斯主義，同時也可藉此了解當時中共學政各界評斷某一思想是否為馬克思主義的標準為何。

